

收稿日期:2024-10-20

新四军调查研究与群众路线的贯彻

耿东旭

(河北地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01)

摘要:新四军承继了红军善于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早在成立初期,新四军一些人员便已开展农村调查研究工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新四军不仅完善了调查研究机构,还深入基层开展调查,形成了许多调查报告。新四军的调查研究以改善民生为目的,通过调查研究,新四军不仅明白了群众的各项诉求,并依据调查结果制定了改善民生的相关法律法规,还通过调查研究不断检测各项政策的实施效果,保证民众生活能够得到切实改善。新四军干部在开展调查研究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形成了一支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干部队伍。

关键词:抗战时期;新四军;调查研究;工作作风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1-0052-09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文献整理、翻译和数据库建设”(AHSKZD2021D06)。

作者简介:耿东旭(1994—),男,甘肃环县人,河北地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八路军、新四军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1.005

毛泽东曾指出:“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的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为此目的,就要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1]802}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提到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的高度,把调查研究作为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锐利武器”^{[2]1}。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开展的调查研究,绝大多数学者从党员领导干部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高工作水平角度,调查研究对科学决策的作用机制,调查研究和行政决策的关系,毛泽东等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等四个方面展开^[3]。也有部分学者从概念史的角度出发,探寻中共革命历程中“调查研究”概念的发展变化^[4]。然而,对于调查研究与党的作风建设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却论述不足。由此,本文拟对新四军的调查研究历程、调查研究目的以及调查研究与民众的关联等方面进行论述,借以揭示调查研究

如何推动和加强干部工作作风建设,以期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新四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历程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两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谓认识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谓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802}早在1938年12月,新四军政治部成立了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薛暮桥任主任。石西民来皖南后,任副主任。成员包括郑铁鹰、许坦克、过鉴清、孙晓梅、周沂、陶白、汪瑛、周婉如、周雯、陈西桥等人^{[5]361}。“首先抽调十余个略有社会科学理论修养和乡村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组织一个调查工作队,给以两星期的专门训练,替他们准备好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提纲。做了一两个月的调查以后,回来检查材料总结经验,再来两星期的业务学习。这样经过一年时间,完成了四个县(指泾县、繁昌、铜陵、南陵四县,当时皖南新四军的全部防区,笔者注)的调查工作。并使大多数的同志学会了调查、整理材料,以及编制报告的全套方法。”^{[6]227-228}经过下乡调查,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共同完成了《皖南农业经营管窥——农村经济研究材料之一(1940年3月)》《皖南农村经济的副业与手工业——农村经济研究材料之二(1940年3月)》《皖南租佃关系一瞥——农村经济研究材料之三(1940年4月)》《皖南农村借贷制度一斑——农村经济研究材料之四(1940年6月)》《皖南土地分配缩影——农村经济研究材料之五(1940年7月)》等调查报告。

伴随着新四军的扩充,其干部队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众多爱国青年学生、知识分子、海外侨胞成为新四军干部中的一员。这些新干部虽然具有较高的爱国热情,富有活力,但有的却“不能深入调查研究,不听下级报告,不愿倾听下面的呼声”^{[7]119}。中共中央对于新四军可能出现的干部队伍不深入调查研究的情况早有预案。1941年8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指出:“抗战以来,我党在了解日本、了解国民党、了解社会情况诸方面,是大进一步了,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作风也减少了。但所了解者,仍然多属粗枝大叶的,漫画式的,缺乏系统的周密的了解,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作风并未彻底消灭……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不但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调查研究是如何的无微不至,就是国民党对于国内外情况,亦比我党所了解的丰富得多。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8]360-361}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各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8]361}。

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各部队设立了相应的调查研究机关。1942年1月,新四军七师特作以下决定:“(1)七师地区的调查研究工作,即由军政党委员会领导,将调查工作列入会议日程,但会议时各有关的负责人当然参加人。七师成立调查研究室,军政党委员会统一全地区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实际指导。调查研究室[设]分类研究整理之股,组织敌工、民运、统战、锄奸、侦察等部门工作。在调查研究方面得[由]调查研究主任指导。(2)各分区军政党小组,统一各该分区调查研究工作之领导。(3)各团[要把]调查研究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并在政治主任下设一调查干事,统一收集各方面材料。现有[设]有政治处者,则按照团级规定组织之。连队建立调查小组,由政指、支书、青年干事、政治战士组织之。”^{[9]44}

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于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中共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

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各地军政党委员会^{[10]423}。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华中局迅速调整了各战略区党委的领导成员,在各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新四军干部自然成为各级党委的负责人,新四军调查工作也就转由各级党委负责。在当时,新四军大量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形成了《淮宝的田亩查登工作(1942年3月)》《涟水县的闸口乡——农村调查资料(1942年5月)》《淮宝县黄集区绥靖乡高利贷调查(1942年夏)》《华中局调查研究室关于阜宁县守望乡四个保的土地分配的调查(1942年8月)》《怎样划分农村各阶层——调查研究整理材料之一(1942年11月)》《淮宝县调查研究报告(1943年2月)》《淮北区陈圩乡按户兴家计划及劳动互助(1943年3月)》《阶级变化与人民生活(1943年5月)》《山头乡二年来雇工调查(1943年10月)》《苏北区党委关于人民生活情况的调查(1943年10月)》《颜圩乡的借贷问题是如何解决的(1943年10月)》《东庙区七贤庄的让息斗争(1943年11月)》《阜东县长兴乡调查(1943年)》《礼南第一乡第一保调查研究材料(1944年1月)》《礼南第二乡第一保的封建势力——调查材料之一(1944年1月)》《安乐殿发两乡乡选经过的调查(1944年2月)》《安乐乡调查(1944年3月)》《二联乡调查(1944年3月)》《二联乡支部调查(1944年3月)》《路东劳动互助的几个初步经验(1944年5月)》《介绍半塔杨言德合作社(1944年11月)》《天高劳动互助问题调查报告(1944年11月)》《铜城市各业利润、工资及工会工作调查(1945年3月)》《大鲍庄互助组是怎样巩固与发展的(1945年8月)》《淮南天高农具工厂的介绍(1945年9月)》《苗桥区调查(1945年9月)》《苗桥乡调查(1945年9月)》等调查报告。

上述的调查报告已经足以证明新四军经常下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工作。“(邓子恢)在皖南一年,几乎跑遍了所有派驻工作队的各个点。他到下面听取民运工作队汇报后,只要有时间,总要找各界人士座谈,听取他们的意见,或者跑到农民家里调查研究。邓子恢在皖南时每到群众家里,总要先揭开锅盖看看,伸手在米缸里摸摸,然后和群众拉家常,问暖问寒,了解情况。有一次,邓子恢到三里店的张村,发现一个积极分子忽然对工作消极起来。他很快就查清了原因,原来是那位积极分子家里的生活发生了困难。他立刻批评那里的民运工作队负责人,工作队不能及时帮助解决困难,这样对待群众,怎么能保持他们的积极性呢?”^{[11]218}这充分说明调查研究是新四军的革命日常活动之一。

二、为群众服务是新四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的目的

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它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想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了解群众的需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1]791-793}对此,新四军各将领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不仅以身作则,亲自到基层从事调查工作,还要求其他干部也进行调查研究。1942年1月,邓子恢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谈到部队的民运工作时讲到:“过去只晓得军民合作打鬼子,现在我们主要是宣传改善民生的法令,同时还可以进行调查工作,调查群众对我们的反映,民生疾苦。在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可以分配哪个部队进行哪个区域的群众工作;流动部队可以帮助训练自卫队、办冬学识字班、找积极分子。”^{[7]124}

调查工作想要有所成就,就必须抓住重点,了解民众的诉求。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曾对皖南地区的农业发展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皖南“农村中只看到土地使用的分散,土地与劳动力不配合的矛盾与病态,而且雇用劳动的使用非常少,最主要的生产劳动工具

——耕牛也很少,分配更是不平均的,经营极度粗放,农民的农本一年年萎缩”^{[12]853}。由于土地分配不均,皖南地区“80%的农民,感到迫切的土地缺乏”,并且因受天灾、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许多民众早已身负巨额债务,只能忍痛出卖自己的土地来还债,这就致使田价更为低落,“显示了农村金融的枯竭,农民连这一块土也不值钱了”^{[12]440-462}。缺乏土地的广大群众只能依附于地主,这就让皖南各县的租佃关系相当发达,“佃农(半自耕农除外)平均占全农户中的55.57%,自耕农仅为各类农户的11.5%,租田在全耕田的总面积里也占了70%左右”^{[12]393}。而地主凭借其拥有的土地资源,可以运用各种租税来盘剥农民。方毅在对盱嘉县安乐乡调查时,曾总结了地主对农民的地租剥削可以分为分租剥削、包租剥削、二老板的剥削以及其他剥削四种,并且这四种剥削下面又分为若干名目的剥削^[13]。在用各种租税剥削农民的同时,地主还凭借其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向广大农民放高利贷,以此剥削人民。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发现,皖南“农民在地租苛杂的高压下,经济地位日趋没落,唯一的出路,便是高利贷……皖南前线四县中的农民,受地主佃租制度的剥削外,高利贷确是农民颈项上第二条沉重的铁索了”^{[12]416}。江风对准宝县黄集区绥靖乡的高利贷调查后,总结了高利贷债主对农民剥削的完整过程是:放债—取利—押地—兼并土地^{[13]497}。显然,仅仅靠耕种土地,普通民众难以维持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能通过发展副业和手工业弥补日常不足。据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显示,皖南地区“一般的副业则都已走上了衰落的途径……副业的衰落,加深了农村经济的崩溃,农民的生活陷入更痛苦的深渊”,相较于副业的衰落,手工业却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种进步和发展不是主动的,而是随着市场法则的波动而转移,是一种散漫的无计划的,因此它的发展与进步,显得非常迟缓与微弱。同时,它没有什么坚强的基础存在,所以经不起外力的轻轻一击”^{[12]381-392}。还有一些民众只能当雇工来补贴家用。但当雇工是有条件的,只有雇主需要劳动力之时,普通民众才能成为雇工。张维城对泗阳县山头乡调查后发现,“雇工的多少,受着年成好坏的支配,年成越好,雇的越多,工资亦愈高。年成越坏雇的人越少,而工资亦愈低”^{[14]250}。淮北区党委曾对涟东县抗战以来雇工工资的涨幅进行了调查,发现“从表面看来,五年来农村雇工工资额,一般都是向上涨……这个工资增加率,大大地赶不上工业品的增加率,甚至较之粮食价格的增加也低了许多……就使雇工实际工资在日趋降低”^{[15]151}。此外,在战时环境下,广大民众还身负各种负担。据淮北县的调查显示,抗日根据地内的民众负担最轻,但也要15至20位生产者才能完全负担起1名脱产者的日常费用,敌占区的民众负担次之,友军区的民众负担最重^{[16]294-296}。由于受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华中地区的民众生活十分困苦。夏忠武在调查礼南第一乡第一保民众生活情况后,发现“抗战以来,人民生活下降的,第一,是敌人的大肆[肆]焚烧,顽军的抢劫勒索,人民损失甚巨,第二,前年及现[再]前年的旱灾,粮食收的太少,第三,法币跌价及农产品价格跌落,农民以自己劳力所得,比以前收获要少一些”^{[17]506}。

通过上述调查,新四军成功了解到民众的基本诉求就是减租、减息、增资以及减轻负担。当然,新四军要想对症下药,让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就必须对调查得到的材料进行细致的研究。正如邓子恢所谈到的,“既调查,还要研究。光调查而不研究,则收集材料不能解决问题;只一般研究,而不深入研究,也会一知半解,把问题弄错”^{[7]292}。实际上,新四军干部在调查完成后,撰写调查报告时,就曾对于民众的各项诉求提出了一些切中肯綮的意见和建议。对于农业,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曾发现在繁昌的平沟铺及南陵黄暮渡一带,敌人利用奸商到内地收买耕牛运到芜湖。其提议到,“对这种事须得严厉杜绝。否则耕牛出口资敌,对农业经营将是一致命的打击”^{[12]374}。对于如何挽救陷入高利贷中的农民,《阜东县长兴乡调查》中曾谈到,“有计划地发展农村生产,以改善贫农生活,减轻脱离高利贷的剥削,组织合作社,广泛地开展这个运动,以减轻农民之资本上的缺陷,这是一个最积极诊治高利贷的办法”^{[18]449-450}。对雇工的工资问题,张维城曾

提议到：“对农村雇工的工资，乡与乡、县与县、区与区，均有所不同，而根据具体情形与具体环境来决定最低与最高工资。工资要高到最高限度，而且还能使老板赚钱，克服工人中这乡与那乡看齐的观点……无限制地增加工资，不但影响富农的生产情绪，而且也影响到工人的失业。”^{[15]251}对于如何通过农救会来改善人民生活，夏忠武讲到，农救会“在组织上：（1）组织农民兴修水利。（2）组织农民换工，换工在农村中原来就很流行，现在把他高级化，固定化与普遍化，在插秧，割麦，打场，秋收中，普遍组织农民换工。（3）组织农民各种副业及肩挑负贩事业，这些组织是多样化，根据他之具体情况，组织各种小型组织，使农民在互助中得到便利与帮助。（4）组织挑锅工人，挑锅工人外出，是有一个集团，把这些集团组织，以收互助之效能”^{[17]515}。

对于调查得出的这些意见，新四军领导人十分重视。《淮宝县调查研究报告》呈送上级阅览后，上级曾批示：“此报告在人民的收支与负担方面，得一可靠的参考材料，有补于精简政策的实施是其主要贡献。”^{[16]299}江风的《二联乡调查》整理报送淮北区党委后，“邓子恢同志看了很喜欢，稿子当时虽然没有付印，但对全区县以上单位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曾起到了推动作用”^{[19]1}。鲁讷的《阶级变化与人民生活》受到《拂晓杂志》编辑的青睐。《拂晓杂志》编辑在按语中写到：“本调查的作者鲁讷同志，是我们近来许多决心到群众中去作实际工作的女同志中最有成绩的一个，从她这个简单的材料中，我们可以说明两个问题：甲、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党的政策在农村中的反映。这说明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进步的合乎大多数人的要求的；乙、它说明我们去到乡间作工作时，必须是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实事求是，才有效果；如果粗枝大叶，好高骛远，就会一事无成。这次鲁讷同志这一个多月的工作，对我们了解情况的帮助，较比过去调查研究集合了将近十人费了三、四个月的工夫还大的多，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所以我特将这材料在这里发表，以便引起大家注意。”^{[18]400}这充分说明调查报告能够受到新四军高级将领的重视，为新四军了解农村状况、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由于明了群众所需，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减租减息、增资政策，将改善民生作为其工作重点。但这些政策实施的效果如何，民众生活究竟有无得到改善，还需通过对民众生活水平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了解。正如庄进于1942年3月在调查淮宝县田亩查登工作后说到，“在党政军民共同的努力进行下，一般的说，今日各级田亩登记委员会是组织起来了，各保登委会也都从事实际工作，有的区长也下乡，集中一切力量，突击田亩查登，已经造成一种热潮”^{[20]26}。有的新四军部队和抗日民主政府所做的改善民生工作略差，对此，新四军通过调查指出他们的不足，以方便其改进。如夏忠武对礼南第一乡第一保的调查显示：“在部队住处，一般农民手头比较宽裕，经济活动……对新四军不满之处，首先是椅桌板凳门窗损坏甚是有的，稻草也糟踏得利害，夫役问题，虽然农民有些收获，但究竟多了一些，特别在农忙时期，有些影响农民生产。”^{[17]509}又如刘子厚在调查礼南第二乡第一保后，发现这个保的特点是“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还保有异常优越的地位”，当抗日民主政权在此地建立后，“地主对我们的态度开始转变了，由隐藏、躲避变成了积极接近，由暗中破坏变成了操纵麻痹”，甚至“利用一般失败情绪和恐吓[怖]心理来实行威吓控制”新四军干部，从而“任意歪曲我们的政策法令，藉我们的政策法令来作威作福，达到压迫群众和自私自利的目的”，比如在减租中，地主们“主要地是利用群众的失败情绪来达到明减暗不减的目的”^{[17]516-522}。

此外，新四军还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了诸多民生改善的真实案例，并将其通报给全党全军干部，让其他干部能够汲取其中的经验。1943年，张维城发现泗阳县颜圩乡干部通过成立减租还债小组、召开减租小组长联席会议和乡民大会等方式，成功动员了广大群众参与减租减息运动，使颜圩乡的借贷问题得到圆满解决^{[15]253-259}。1944年春，淮南地区合作社事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各地都是自己摸索，干部“均苦于经验不够”。在此情况下，刘顺元就总结了历史长、规模大

的半塔合作社的发展经验,作为其他后起合作社的榜样和参考^{[21]427}。而张劲夫根据淮南区党委召集的24个较好的劳动互助组长所开的一天座谈会材料,以及淮南各地所得的其他材料,成功归纳出路东地区劳动互助的一些经验^{[22]127}。1945年,秋谷调查了当时闻名全国的淮南天高农具工厂,介绍了其发展历程、工人的思想教育以及为人民群众所做的各种好事^{[21]525-529}。

正因为新四军不断通过调查研究了解人民群众真正的需求,制定与之适配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且一直通过检测政府政策的执行程度,纠正政策落地中的偏差,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鲁訥于1943年对农村各阶级生活状况的调查显示,自抗日民主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政策后,“生活真正改善的是贫农……除了个别的贫农田我们在抽田时的错误(有地主中农抽贫农用的),或家里生病死人等原因而生活下降外,一般的贫农,多多少少在生活上改善了些”^{[8]400-405}。

三、依靠群众是新四军调查研究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

新四军的调查研究工作想要取得成功,自然需要群众的紧密配合。陈毅在回忆1938年初到江南时的情况时说到:“打着各种番号的中国军队和地方武装不敢跟鬼子打仗,或者一打就垮,甚至有不打就垮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那时候,在人民群众中间,标语口号不准写,说是怕日本人烧房子;民间祠堂不让新四军住,怕鬼子来杀人;马路铁道不叫你破坏,你破坏,就是引敌人来烧杀。那时候,到处听到这样的论调:‘不要在我们这个地方打仗,你打仗到远处去!’陈司令,你司令部仅仅7条枪,你赶快走吧,敌人包围来,你穿便衣都跑不脱。‘可怜的新四军,无衣无食,还爱打仗,我们得做道场替他们超度超度’。”^{[23]29}随着新四军的英勇奋战,许多民众对新四军的印象有所改观,但其内心却流露出一种复杂心态。礼南第一乡第一保的民众认为“新四军讲纪律,是穷人的队伍,讲道理,公买公卖,有话准人说”,新四军“对他们好,他们是相信,但过去失败的疮[创]痛,他难于忘却,同时新四军今后能否在此坚持,他确无把握,所以群众一般采取观望态度,你叫他参加工作,他总说:‘我们此地是先进地方,只要别的地方搞起来,我们这里决无问题的’。他不愿出人头地,打先锋,他认为参加了农救,也就等于参加新四军工作,将来不能脱乎,又怕是巧招兵,又怕开会耽误工夫”^{[17]508-511}!民众的这种态度和反应使新四军的调查研究工作充满了困难。江瑛在回忆新四军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下乡调查的情况时说到:“由于我们小组里没有安徽同志,工作起初是有些困难的,对当地风俗习惯不了解,语言又有些隔阂,如何与当地农民特别是与多数的妇女群众,所谓婆婆妈妈、大嫂子、小姑子打好交道,进而动员她们与家庭成员帮助我们进行工作,是一件首先要解决的吃力的事。”^{[24]259}1941年8月,罗炳辉到江苏淮阴、泗阳地区开展民运工作调查时,向民众询问苛捐杂税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情形,有的笑着沉默,有的答非所问,有的低头叹气,还有的“见到我们,总是躲躲避避的”^{[25]73-75}。夏忠武在调查礼南第一乡第一保的情况后,发现民众“对地主士绅一般还有些怕,基本群众对我干部说地主之事,总是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有时候惊惶失措,怕别人知道,或者对你说,要代他保守秘密,不要说是他说的”^{[17]511}。显然,若是民众不配合,新四军的调查研究工作会陷入困顿之局面,所得到的数据也就不一定准确,这无疑会影响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各项决策的制定。

为使民众能够积极配合调查研究工作,有的新四军人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与民众打成一片,在与民众的日常交谈中获取各种讯息。郑铁鹰在回忆皖南农村经济调查委员会的工作情形时谈到:“调查方式是分头出去,与群众同生活同劳动,用聊天的形式收集材料,有时要收集一些专题需要的材料,可不像竹筒倒豆子那样顺当。我们只有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能吃得下,才能获得群众的信任,才能听到知心话。如有的地方群众是烧牛粪的,一大堆牛粪倒上水以后,我们便争着脱掉鞋袜,用双脚拼命地踩和着,然后再分成一团团的,糊在墙上压扁,晒干。所以,我们能听到他们诉说苦泪史。”^{[26]470}汪瑛在回忆孙晓梅进行调查研究的场景时讲到:“她常常以平易亲切的

态度,能很快和妇女群众交上朋友,使得出去时遇到的大娘大嫂和工作组常驻地的大爷、大娘们,都从接触中称赞她:“你这个女兵真好!”她常常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接近群众,经常帮助她们“烧火”(做饭时)、抱孩子、洗衣服和打扫房子,给她们讲抗日道理,逐渐使她们和新四军的军民关系越来越密切(当时皖南还有大量国民党军队驻扎)。我们所需要的经济情况和一些资料往往会很快收集到,或得到了重要线索工作得以顺利进行。”^{[24]259}

有的新四军将领通过开群众大会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借以聆听民众的意见。如罗炳辉在江苏淮阴、泗阳地区时,为了让民众讲出实情,请广大群众来开会。在会议中,他首先向民众说明此次来意就是改善民生,恢复社会秩序,向民众“宣布我们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三三制,三七分租,分半给息,统一战线等)”,然后承认了新四军在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各种缺点,并向民众解释新四军出现缺点的原因,最后又向民众说到,“今天的敌人,主要是日本鬼子,如果中国人大家不齐心,闹意见,自己打自己,那就会同归于尽。我们军队过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可以说清楚”。通过此番质朴、诚恳的话语,罗炳辉成功打动了群众。此次群众大会之后,罗炳辉继续找老百姓谈话,发现老百姓已经不怎样疏远他了,老百姓向其讲述自身遇到的各种困难^{[25]77-78}。

有的新四军干部通过与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交流而获得调查材料。据江风所说,《二联乡调查》“是通过直接帮助二联乡干部工作来进行的,帮助的方法主要是给他们整理经验,必要时才给他们想点子,最必要的时候是把他们不容易反映到上级的正确意见反映上去,即是说,注意到培养和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而不是直接指挥或代替他们工作。这些对他们的帮助,使我得以跟他们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党员及干部都叫我同志,群众都叫我先生,而不是给我加上任何头衔;此外,我把党与政府发我的保健费,用作日常招待客人黄烟;补助品的代金,用作买肉菜应酬;开调查会的时候,也设法把到会的人招待周到。跟农村干部、党员、群众接触得多,这就使我能确信他们所说,我所记录的材料,是比较接近真实的材料”^{[19]3-4}。而江风撰写的另一篇调查报告《苗桥区调查》,其调查材料“绝大部分系由该区区长兼区委书记蔡正刚同志及区农救会主任兼组织委员孙克诚同志口述,极少数部分是从旁搜集的。蔡同志是本区蔡楼乡人,四年前任中区区员,后随部队到路东作地方工作,去年随部队西返。孙同志四年前在部队工作,撤退时因有眼病留地方,几年中任秘密党区委书记,是本区河北乡人,他们对本区情况都很熟悉”^{[19]197}。

想要全面、客观地了解群众工作,就必须让调查研究人员明白调查研究的意义。为做到这一步,1943年7月,刘瑞龙、唐劲实在《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应立即实行深刻的讨论,并即实行自上而下地深入地普遍地动员,加强每个进行调查工作人员的观念,使其了解此项调查研究工作的意义,在此工作上发挥最大的积极性。”^{[27]131}新四军人员在下乡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经逐渐体悟到调查研究的意义与目的了。一些新四军干部则认识到群众工作的开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1943年2月,淮北区党委在总结以往调查研究工作存在的不足时,曾谈到不少负责干部“一下要想各方面都调查好,列了许多项目,结果毫无所成”^{[7]453}。刘瑞龙、唐劲实曾谈到,“因为各县区的具体环境、主观力量和工作基础的不同,及我们所要调查的材料,都不是一般地呈现于表面可以‘探囊取物’似的获得,及在主客观还存在不少的困难,使完成此种工作必须经过艰苦过程”,为顺利完成调查工作,其还总结了调查实施的步骤为制定周密的计划、确定严格的检查督促制度和确立一定时期内的报告总结制度^{[27]130-131}。张维城在调查颜圩乡的借贷问题后,更是亲身体会到:“离开工作,孤立的去进行调查是不能达到什么具体确实的材料。颜圩乡的减息还债的调查,就是在进行还债减息工作时得到的。工作越做得好、彻底,而调查工作也越好,材料越真实,工作不能一下子做好,调查也不能一次弄清,工作逐渐深入,调查也逐渐确实,调查研究离开了实际工作,便无法进行好,实际工作不注意调查研究,也不能搅得通。”^{[15]257}

也有的新四军干部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想要做好群众工作的关键是下基层,了解群众的诉求。1941年,罗炳辉在总结淮阴、泗阳地区调研的经验教训时说到:“一切工作应该接近下层深入群众,否则一切都是空的……做群众工作要耐心……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做行政工作,如果自己不处处听群众的呼声,精细分析思考,单是听下级的报告,那是官僚主义,认不清客观现实的……对群众讲话,要注意对象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角度去开始,多解决他们中的切身问题,态度要诚恳、客气。”^{[25]88-89}由于对群众工作的中心有了清醒的认知,新四军在开展群众工作时,特别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如1944年夏秋之际,鄂豫边区各地发生了严重的旱灾,8月12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电,要求“各项生产救灾工作是很细密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必须深入下层,调查研究,吸取群众意见和经验,并经过群众的讨论和决定来进行,才能切实有效。粗枝大叶,官僚主义,则必扰民有余,救灾不足,必须教育各级干部改变这种作风”^{[28]443}。

正是因为能够在调查研究中能够与群众进行深入交流,新四军成功搜集到各种材料。新四军并不是每个乡、保都进行调查研究,而是跳跃式地调查几个乡、保,根据典型,得出规律^{[7]143}。毛泽东曾言:“要争取和依靠农民,就要调查农村。方法是调查一两个或几个农村,花几个星期的时间,弄清农村阶级力量,经济情况,生活条件等问题。像党的总书记这样主要的领导人员,要亲自动手,了解一两个农村,争取一些时间去做,这是划得来的。麻雀虽然很多,不需要分析每个麻雀,解剖一两个就够了。”^{[2]64}新四军的调查研究从典型入手,这是最切实的进行研究的办法。

综上所述,整个抗战时期,新四军广大干部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撰写大量的调查报告,新四军据此制定了改善民生的各项举措,使民众生活水平得以提升。正因如此,新四军和广大民众结成了新的“利益共同体”,休戚相关,荣辱与共。正如罗炳辉曾谈到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和民众打成一片’。我们的指挥员不但有深入部队与战斗员同甘苦共患难的责任,而且也有深入并接近民众的责任,因为群众的要求和利益,就是我们革命军队行动的基准和目标”^{[25]71}。不仅如此,许多新四军干部对如何开展群众工作有了更深的体悟,即必须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新四军广大干部转变了工作作风,形成了一支善于并且乐于进行调查研究的队伍。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中国统计学会马克思主义统计理论课题组. 毛泽东论调查研究[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6.
- [3] 刘桂云. 关于调查研究的研究综述[J]. 合作经济与科技,2021(7):136-137.
- [4] 许江,王建华. 概念形塑:中共革命语境中的“调查研究”[J]. 福建论坛,2023(3):75-87.
- [5] 范世涛,薛小和. 薛暮桥年谱:1904—1952[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 [6] 薛暮桥. 薛暮桥文集:第2卷[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1.
- [7] 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江苏省泗洪县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邓子恢淮北汽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审委员会. 皖江抗日根据地[M]. 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1] 邓子恢传编辑委员会. 邓子恢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12]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 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二[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 [13] 安乐乡调查[J]. 真理,1944(16):12-14.
- [14]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 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1卷[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 [15] 欧远方,王克,王志铨,等.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3辑):第1册[M].合肥: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1984.
- [16] 欧远方,王克,王志铨,等.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2辑):第1册[M].合肥: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1985.
- [17] 鄂豫边区财经史编委会,等.华中抗日根据地财经史料选编:鄂豫边区、新四军五师部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
- [18]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2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
- [19] 豫鲁苏皖边区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办公室.淮北农村调查[M].内部资料,1984.
- [20] 欧远方,王克,王志铨,等.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5辑[M].合肥: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1985.
- [21] 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一[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 [22] 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江苏部分):第3卷[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 [23] 南京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征战在江淮河汉之间:新四军将士抗战回忆录选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
- [24] 鲍志华.孙晓梅:大时代的女性[M].北京:现代出版社,2014.
- [25] 中国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罗炳辉文集[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
- [26] 安徽省档案馆,安徽省博物馆,新四军军部旧址纪念馆.新四军在皖南[M].内部资料,1985.
- [27] 欧远方,王克,王志铨,等.淮北抗日根据地史料选辑:第6辑[M].合肥:豫皖苏鲁边区党史办公室,安徽省档案馆,1985.
- [28]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The New Fourth Army's Survey Resear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Mass Line

GENG Dongxu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GE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New Fourth Army inherited the fine tradition of the Red Army's survey research. As early as its founding phase, some member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had begun rural survey research.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New Fourth Army not only improved its survey research institutions but also conducted in-depth investigations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resulting in many survey reports. The survey research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im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s. Through this research, they not only understood the various demands of the masses but also formulated var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Additionally, they continuously assessed the effects of various policies through research to ensure tangible improvements in people's lives. The cadre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dhered to the mass line, kept in close contact with the masses,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ir work style, and formed a cadre team that used power for the people, cared for the people, and sought benefits for the people during their survey and research process.

Key words: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New Fourth Army; survey research; work style

〔责任编辑:朱 根〕